

治理整顿 与深化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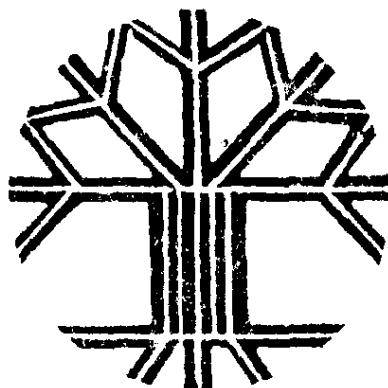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学术组



•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 •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学术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成都

责任编辑：何朝霞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 蓉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6.75 插页4 字数390千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367—1/F·106 印数：1—1380

定价：6.8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社会主义的理想经过人们的实践，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人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根据不同的国情去发展，又怎样一步一步地过渡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迈开了步伐，正在世界的东方这块巨大的土地上，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索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发展，从总体上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宏伟的工程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又不

断地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去加以解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适应历史任务的需要，列入国家教委“七五”科研规划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1986年9月在成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提出了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在这次会议的推动和国家教委、全国高校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积极赞助下，决定出版一套系列丛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它由全国高校每年一次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科研成果和“七五”科研规划中高校的重点经济学专著组成，计划在“七五”期间每年推出数种。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和读者见面了。我们衷心地期望，丛书的作者和读者都共同来关心它，支持它，帮助它，让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经济理论上作出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以利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编委会

作者·编者

参加本书撰写的专家和学者有（按文章编排为序）：

逄锦聚	黄泰岩	刘桂斌	龙玮娟	宋 涛	梁尚敏	邹东涛
宋 立	单庆江	洪银兴	邓映翎	贾秀岩	张念瑜	何孝星
王光伟	韩明希	王 荣	袁文平	刘光杰	温端云	常修泽
刘永成	耿 刚	于金富	王国刚	张维达	陈秀山	周晓明
何炼成	詹连富	丁任重	陈甬军	钟禄俊	杨继瑞	牛江涛
魏 杰	傅军胜	董新保	周 春	刘迎秋	王奇华	刘 灿
卫兴华	蒋家俊	赵兴汉	张晋光	潘 石	张胜宏	蔡继明
金雪军	张朝尊	吕益民	林 叶	柳 欣	刘 伟	谭崇台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魏杰，北京大学陈德华，南京大学洪银兴，东北师范大学韩明希，吉林大学潘石共同审编。中国人民大学钟亚平参加了审编过程中的有关工作。

编 者

1991年元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政策选择

- 一 要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1)
- 二 深化改革的力度与政策选择 (11)
- 三 深化改革的难点、对策及过渡模式 (24)
- 四 缓解市场疲软 扭转资金“体外循环” (35)
- 五 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和商品市场疲软
 的几个问题 (45)

第二部分 宏观经济调控

- 一 宏观调控体系 (58)
- 二 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 (70)
- 三 非均衡市场与宏观调控 (79)

四	宏观调控中的资金积累机制	(87)
五	宏观调控中的金融机制	(106)
六	宏观调控与通货膨胀	(116)
七	宏观调控与产业结构调整	(125)
八	结构调整与资金流动	(136)
九	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流动	(144)

第三部分 企业制度

一	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关系	(158)
二	全民所有制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167)
三	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构想及对策	(177)
四	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系统操作	(187)
五	全民企业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	(196)
六	承包模式的战略转换	(208)
七	转移国有资产管理重心为资产增值	(215)

第四部分 计划与市场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229)
二	计划与市场功能	(237)
三	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248)
四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辨析	(254)
五	计划与市场结合诸论析	(259)
六	计划与市场的非均衡结合	(266)
七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耦合	(276)
八	对指导性计划的考察	(286)
九	计划和市场的双层次结合	(294)

十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多维统一	(307)
十一	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覆盖全社会	(317)
十二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过程	(324)
十三	计划与市场的宏观结合	(332)
十四	计划商品经济的市场发育	(344)
十五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两阶段模式	(354)
十六	计划与市场在流通领域的结合	(362)
十七	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与价格体制改革	(373)
十八	粮食价格改革展望	(381)

第五部分 收入分配

一	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涵义及衡量标准	(391)
二	切实理顺分配关系	(403)
三	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	(412)
四	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思路的比较	(422)

第六部分 土地问题

一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几个问题	(431)
二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与转换	(444)

第七部分 借鉴与比较

一	新古典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458)
二	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矛盾和困难	(471)
三	从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看我国的两个经济问题	(483)

- 附录一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第五次会议纪要..... (495)
- 附录二 促进学术交流 发展经济科学——全国高校**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的五年..... (517)

第一部分

政策选择

一 要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一) 效益下滑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阻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巨大障碍

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但勿庸讳言，1984年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一些重要经济效益指标逐渐下滑，以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我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979年为6.3%，1984年达到7.8%，其后便出现下降趋势，1986年只有4.8%，1987、1988年虽有回升，但1989年又跌至1.6%^①。国营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78年为24%，1984年上升到25.1%，1988年下降为22.6%；资金利润率的情况是，1978年为15.2%，1984年为15%，1988年下降为10.5%，比1984年下降4.5个百分点。

^①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89，第48页数字测算。

点，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少实现利润100亿元。投资系数（每新增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所需的 投资），1984年为1.59，1988年上升到3.09，大量投资被占压在建设过程中，或者形成的固定资产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①。1989年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到年底，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559亿元，比上年仅增长0.2%，其中利润下降18.8%，税金上升16%；亏损企业增亏1.2倍，可比产品成本上升22.4%。12月末，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增加391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加额的56%。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77.4亿元，比上年下降37.9%，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加43%，商品流通费用率普遍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放慢^②，进入1990年，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没有明显好转。

经济效益下滑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一，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集建国40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决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但在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下，或高投入低产出，或只投入不产出，其结果必然导致财政、信贷、物资等多方面关系紧张，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由此，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方针，压缩财政支出，抽紧银根，降低增长速度。这便使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剧烈的波动。1984年以后在短短5年左右的时间内，国民经济出现两次膨胀——紧缩的摇摆状态，原因固然很多，但无疑这是一种经济效益低下的明显症状。

第二，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扩展。对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西方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看重的是货币，我国不少经济学家则

①参见《求是》1990年第11期。

②1990年1月25日《经济参考》。

注重对总需求的分析。实际上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效益低下。道理很简单，如果一种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很高，经济效益很好，那么只要投入的货币不是绝对地超出经济的需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滞，便会引起产出（供给）的增加，从而达到供求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的增加只能引起物价的暂时上升，而不会导致物价持续的上涨。相反，如果一种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很低，经济效益下降，那么即使按照正常需要量投入货币，也很难引起供给的相应增加（或很少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供求的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发生。

1984年以后，当我国经济效益开始下滑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威胁事实上就具有了现实性。但我们不仅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抑制货币投入的增加，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扭转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其结果，不仅导致了通货膨胀发生，而且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扩展，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一段时期内陷入了经济效益下滑—通货膨胀—效益更下滑—通货膨胀扩展的恶性循环。

第三，严重地影响了改革的正常进行和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经济效益下降和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失衡、通货膨胀，使许多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许多即将出台的措施不得不延缓实施。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中央实行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无疑，改革开放仍要进行，但很显然，步伐要放慢，在过去的二三年时间内，改革服从于治理整顿的要求，各项改革措施必须紧紧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高经济效益。

治理整顿是要达到一定目标的。这些目标包括：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

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合理的宏观调控体系。很显然，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没有经济效益的稳定提高，治理整顿就不能算达到了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过去的近两年的治理整顿虽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经济效益下滑的状况尚未好转，直到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0年1—5月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仍然指出：“市场销售不畅，工业产成品积压，生产效益低下，财政困难等状态仍未明显改善。”^①情况再一次表明，经济效益下滑不仅是制约经济发展，导致通货膨胀的症结所在，也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巨大障碍。如果不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即使被暂时地扼制下去，但从长远看，也难以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

（二）效益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体制下经济运行机制的扭曲

从动态的角度，把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看，经济效益既是许多问题发生的原因，也是一系列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为了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有必要首先把它作为一种结果，以分析导致经济效益下滑的原因。

应该指出，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即使将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因素存而不论，单就经济因素而言，就包括：科

^①1990年6月19日《经济日报》。

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程度，劳动者的素质及技术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归属及生产工具的装备水平，劳动组织和生产组织的状况，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及市场发育的状况，等等。但从我国1984年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在导致经济效益下滑的诸种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二元体制以及在二元体制下经济运行机制的扭曲。

我国改革的理想目标是要变高度集中统一、排斥市场机制的旧经济体制为新的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但1984年以后，经济体制却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第一，企业双重依赖加强。一方面，企业开始摆脱各级行政部门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有条件地扩大了供产销、人财物诸方面的自主权。企业行为主体由政府向厂长（经理）和企业职工转变，企业行为方式从高度单向依赖政府向对政府和市场的双向依赖转变。企业开始注意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则，试图在市场活动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并力图学会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为争取有限的盈利机会而竞争。它们开始依照市场状况安排自己的投资方向和产品结构，吞吐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然要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控制，相当数量企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实行指令性计划，所需资金要受到指标控制。在这些情况下，企业行为主体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企业的行为只能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

第二，宏观管理体制“二元”或“多元”的特征加强。

首先是计划的“多元”化。1984年后的计划管理形式，不仅有指令性计划，而且有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指令性计划管理。基本上沿袭过去的作法，原材料上级调拨，低价配给，资金

无偿拨付或银行低息贷款，产品计划收购，统包统销。而市场调节则放任价值规律自动调节，国家基本上不予干预。根据三种计划管理形式的要求，企业产品都分类排队，有的属指令性计划由国家直接控制，有的则可以自由购销，有的虽然也要接受上级指导性计划，但这种计划很少约束力，只是参考而已。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也很难建立自我约束的内部经营机制。

其次是投资体制的多元化。1984年以后，不仅中央政府仍然拥有相当部分的投资权，而且各级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措施的实施而拥有了相当大的财力，加上投资可以使地方在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有利可图而不必承担风险，所以也成为重要的投资者，而企业，由于预算机制软化和投资饥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等原因，投资欲望也未削减，所以实际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再次是宏观调控手段多元化。就金融手段说，一方面中央银行依然隶属于中央政府，传统体制下弥补赤字靠向银行透支的方法依然实行；另一方面专业银行又开始实行“企业化”。利率大部分是固定的，但也出现了浮动利率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自由利率。财政体制，一方面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制仍然沿续，但另一方面，由于利改税、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措施的实施，预算外资金比重越来越大，地方财力和企业留利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资金的使用越来越分散化和市场化。

第三，价格机制多轨化。1984年以后，形成了多种价格：计划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等等。有的是不同商品采用不同的价格形式，有的是同一商品采取多种价格形式。不管哪种情况，一般都是计划价格较低，而自由价格较高，计划内外价格差别悬

殊。这样，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一般都要处理复杂的比价关系：本企业产品计划价和市场价的比价关系，本企业产品计划价和所需原材料市场价的比价关系，本企业产品市场价和所需原材料计划价的比价关系，本企业产品市场价和所需原材料市场价的比价关系。而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则要靠多种价格信号的引导而进行资源配置。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改革进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原来的一元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沿变为多元体制，其中最基本的是计划体制和商品经济体制并存的二元体制。这二元体制并存、摩擦、碰撞和对峙，大大抵消了改革的积极效果，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下降。

第一，二元体制扼制了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发挥，导致了微观效益的下降。从1984年以后的实际情况看，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对象往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尽管技术、人力、装备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但由于生产、交换、分配诸环节都受到指令性计划的制约，企业对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产品方面的调整、企业内部的挖潜都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应有的自主权。由于留利水平也受指令性计划的制约，所以企业可自主支配的财力也极其有限。这样，大企业犹如被缚住手脚的力士进入拳击场，尽管相对其对手优势明显，但在争斗中因其优势不能发挥，也只能败下阵来。改革进程中曾出现“国营的不如集体的（企业），集体的不如个体的”扭曲现象，就是上述问题的反映。当然，这与二元体制下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也不无关系。对于众多的小企业来说，由于大都实行市场调节，受到的体制束缚小，在竞争中可能暂时处于优势，获利甚多，但由于二元体制下经济秩序的紊乱和宏观调控的乏力，所以稍有波折（如通货膨